

、 研判報告

壹、 政治

葉非比

江澤民南巡廣東鞏固權威。其「皇帝化」固權作風招致批判，「十六大」是否延任爭論浮現，影響中共高層政局走勢。中共面臨信仰危機及貪腐橫生重大挑戰。從嚴治黨與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為當前「黨建」重中之重。縣級「三講」及黨風廉政運動達到高峰。

九屆三次「人大」、「政協」會議以經濟前瞻佈局為主軸，「西部大開發」啟動第二次改革開放。「立法法」通過，進一步擴大「人大」權力，李鵬藉以掣肘朱內閣。

中共建政以來規模最大之政府機構改革進度嚴重延宕。省市級機構改革至 2000 年初由北京市、廣東省開始推動。

體制內外「政改」呼聲重現，要求建立權力監督機制。朱鎔基呼應支持，江澤民審慎壓制。

2000 年 1 至 3 月大陸整體政治情勢隱現波濤。江澤民親自推動縣級「三講」運動，企圖仿鄧小平南巡模式造成聲勢。鞏固軍權，壓抑政改，打擊法輪功與異議分子，政策進一步左轉緊縮。以政治整風手段因應社會不安情勢。廈門遠華集團走私大案暴露高幹貪腐內情，反腐敗鬥爭成為江、李、朱派系角力之工具，「十六大」權力再分配過程引人關注。

以下謹從大陸政情穩定及不穩定兩面因素簡析大陸政治情勢現況：

大陸政情穩定的正面（有利）因素

一、江澤民積極鞏固權位

南巡廣東，樹立權威

江澤民於 2 月下旬至廣東、福建等地視察，外界高度關注，將之與鄧小平 1992 年南巡相提並論。一度傳出可能與深圳將升格為直轄市，及拔擢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有關。實則此行旨在鼓勵科技發展創新高，並部署新時期「黨建」工作（啟動縣級「三講」運動）。江為因應黨內離心愈來愈嚴重之傾向，企圖造成聲勢，於政治上及歷史上達成里程碑之作用，並為「十六大」作理論準備（香港太陽報，2000.2.27）。3 月間大陸掀起學習江澤民南巡講話風潮，中宣部命令加大宣傳江講話之力度，致媒體相關報導熱度壓過「人大」、「政協」會議新聞，再次凸顯其權力獨尊地位。

爭取軍方及元老幹部支持

中共軍方因應內外局勢建立「防攻兼備」的新軍事發展戰略，對決策影響力擴大，成為中共高層要角競相爭取之對象。江澤民牢控軍權，為免予政敵留下把柄，對臺等政策爰「寧左勿右」。軍委副主席張萬年再次強調全軍應更加自覺維護江核心領導權威，貫徹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新華社，2000.1.15）。2 月下旬江前往東南各省之軍區視察，3 月「兩會」期間呼應軍方代表強硬黷武言論，指出應牢固樹立戰備觀念，提高戰鬥力，則「國家安全與統一大業愈有保證」（新華社，2000.3.9）。3 月 12 日中新社轉發解放軍報專文，尊崇江為「最高統帥」。分析家認為 2002 年「十六大」時不論江是否讓出「國家主席」及總書記的位置，都極不可能交出軍委會主席乙職（夏文思，「江澤民預謀以軍控政」，開放雜誌，2000.2，pp.12-13）。另據悉江澤民已展開行動，爭取元老幹部支持渠在健康許可情況下續任國家領導人，並支持渠主導之人事接班佈局。江推出高幹優惠退休及福利措施，保證將聽取這些「國家財富」對重要黨政決策之看法（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0.1.28）。

消息傳出江澤民刻主導規劃籌設「國家安全委員會」，為政治局提供外交、軍事、經濟和科技等方面的政策建議，此將對中共的長期發展及安全戰略利益產生重大影響。重要成員預計包括胡錦濤（「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中組部長）、遲浩田（「國防部長」）、許永躍（「國安部長」）、熊光楷（共軍「副總參謀長」）、劉華秋（中央外事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等（關島，「國家安全委員會何時出臺？」，開放雜誌，2000.2，pp.14-15。若陽，「江澤民的外患和內憂」，廣角鏡月刊，2000.2，pp.36-39）。一方面係江澤民因應國際局勢設置此一諮詢機構，以確保中共作為「準超級大國」的戰略地位，另一方面使渠掌握國家戰略決策大權，並於「十六大」後藉以延續政策影響力。

二、召開九屆三次「人大」、「政協」會議 焦點話題為西部大開發及貪腐違紀問題

「人大」、「政協」九屆三次會議分別於3月5至15日及3至11日召開，係世紀交替年之重要會議，於2002年中共「十六大」前進行期中施政檢討。此次會議焦點以西部大開發為跨世紀代表性議題，（9省、1市自治區、土地面積540萬平方公里、2.85億人，分別佔全國之57%及23%。惟人均僅有全國水平之一半左右）。大陸當局著眼於實現共富、民族團結、社會穩定與邊疆安全，並盼有助於擴大內需、開拓市場、支撐經濟發展與現代化建設（下世紀中葉達到已開發國家水平），以克服發展與環境、人口與資源間日趨尖銳之矛盾。朱鎔基將任「西部開發領導小組組長」，「國家計委主任」曾培炎並表示本年投注經費將達數千億人民幣（國債基金之70%，另增加8百億國外貸款配合進行。）（新華社，2000.3.6）。預計為年內「十五」計畫之核心內容（9、10月間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制定，2001至2005年施行），有啟動第二次改革開放之意涵。

貪腐情勢亦為「兩會」代表討論重點，朱鎔基於會中強力反貪宣示獲最熱烈掌聲。「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蕭揚、「最高檢察院院長」韓杼濱報告揭露貪腐違紀問題嚴重，包括1999年揭發的瀆職事件達13萬零4百多起，立案偵查貪賄5萬元以上案件達7725件，較1998年增加40%（新華社，2000.3.10）。惟「兩院」報告所獲得票率分別為75%、71.7%，較上年下降（77.6%及77.9%），

表達「兩會」代表對政府反貪工作之強力質疑。

政府工作報告擘劃經濟發展遠景，財經規劃指標趨向務實

朱鎔基提出政府工作報告(1萬6千字、10個部分)強調大陸整體政經情勢之宏觀展望，展現朱內閣之自信。其中5部分為經濟議題，惟首度未提及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強調擴大內需之必要性(發行1千億長期國債)、推進經濟結構戰略調整(重點投向基礎、科教、生態建設及技術改造)、加強改革與管理、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及從嚴治政等。並首度以單獨條目列舉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及「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新華社，2000.3.5)。

「國家計委主任」曾培炎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報告中指出2000年大陸經濟成長率指標為7%左右(上年實際成長率為7.1%)，進出口總額成長3%(1999年出口實際成長為6.1%)。務實體認未來成長趨緩，當前經社發展面臨有效需求不足、就業壓力加大、農民收入增長減緩、經濟結構不合理及生態環境惡化之困難局面。「財政部長」項懷誠之預算報告則指出今年預算赤字安排達2,299億元，為歷年最多(約合280億美元，較上年之1,759億增加28%，佔國民生產總值1.6%)。而國防支出預算則為1,205億元，較上年增長12.7%(新華社，2000.3.6)。

「人大」立法權限加強，欲扮演更積極角色

九屆「人大」在「依法治國」目標下，「經濟立法」與「經濟監督」肆應情勢需求有加強趨勢。李鵬一再強調加大對「一府兩院」的監督工作，力圖運用「人大」舞臺指揮朱內閣。「人大常委會」於3月2日通過加強對「國務院」經濟工作監督的決定，規定「國務院」有關國民經濟及社會發展年度計畫、5年計畫及長遠規畫草案，應於「人大」會期舉行的一個月前先送「人大常委會」(新華社，2000.3.2)。

此次「人大」會議審議通過「立法法」，統一法制，象徵「人大」立法自主權上升，訂於7月1日開始實施。其中廢除勞教制度為一突破，承認只有法院能剝奪人身自由。並規定關係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及民、刑法

等法律制度共 10 項之立法為「人大」及其常委會專屬權限。李鵬親自宣讀「人大工作報告」，打破中共建政以來之慣例(以往均由「副委員長」報告)。「人大」並盼於九屆任期內編纂成民法典，及推動 5 年內「監督法」出臺(據統計自 1993 年至 1999 年底先後有 1,600 人次「人大」代表提出制定「監督法」之提案要求)。凡此皆顯示「人大」亟欲擺脫橡皮圖章之形象，在李鵬強勢主導下，未來影響力預期可進一步上升。

「政協」企圖提高能見度與影響力，強化參政議政功能

「政協」(3 大職能為政治協商、民主監督與參政議政)年來角色漸趨活躍。除重視「調查研究」外，並加入「建立言論」，有系統編纂「國是建言」，盼獲決策高層重視。一方面中共高層藉以彰顯團結與民主，另一方面係「政協」代表之體察與自覺，體現於加強提案、議會外交(年來派出 18 個代表團訪問 25 個國家)、反映社情民意等面向。據統計九屆二次會議一年來「政協」共提案 3,341 件，意見獲解決或計劃解決者 2,542 件，佔 84.6% (提案委員佔總人數 79.5%，內容包羅萬象，經濟建設議題佔 42.9%) (新華社，2000.3.3)。本次「政協」開幕式除「副主席」葉選平所作常委會工作報告外，並由另一副主席周鐵農作提案工作報告(過去 11 年來安排於會期中報告，而非開幕式)。而年來李瑞環及多名「政協副主席」(胡啟立等，以民主黨派為主)並多次向中共高層提出政改方案，成為體制內推動力量。

三、「三講」運動邁向高峰，從嚴治黨

江澤民親自推動縣級「三講」，強固思想政治工作

中共中央自 1998 年底掀起的「三講」整黨整風運動(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勢頭愈演愈烈，藉由自我剖析、群眾評議及無記名投票方式對各級官員進行監督，亦為大規模的組織整頓。揭示事關黨的前途命運、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及民族復興大業。至上年底省部級領導班子集中教育已告一段落，目前正推動「回頭看」檢討活動以鞏固成果。44 個中央「三講」教育檢查組，陸續派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進行檢查督促與工作指

導(新華社, 2000.3.2)。2月下旬中宣部出版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論思想政治工作乙書, 作為2000年黨員幹部學習重點(新華社, 2000.2.21), 將「三講」經驗推到與毛、鄧理論並列之高度。3月初部務會議強調將「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視為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問題, 為黨的建設重中之重。宣傳著力點在基層, 貼近人民群眾(新華社, 2000.3.1)。3月下旬「三講」教育聯繫會負責人張全景(前中組部長)指出此次回頭看事關「三講」成敗的高度, 應把「講學習」放在首位, 認真學習江澤民最近提出之「三個代表」(黨總是代表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及「致富思源、富而思進」等重要講話(新華社, 2000.3.24)。

在縣級「三講」運動方面, 大陸2,800多個縣(市區)、11萬名縣級領導幹部, 原則分兩批舉行, 每期集中教育2至3個月, 預計於7、8月間告一段落。由於地方當局對中央政令陽奉陰違(普遍存在懷疑心態、旁觀心態、觀望心態及畏懼心態。本會資料, 2000.2), 為掃除阻力, 避免半途而廢, 江澤民親自出馬推動整頓(亞洲週刊, 2000.2.28-3.5, pp.16-17)。年初責成7名政治局常委分赴各縣作深入調查, 包括李鵬赴江蘇(張家港市)、朱鎔基赴河北(豐南市)、李瑞環赴浙江(餘杭市)、胡錦濤赴四川(什邡市)、尉健行赴遼寧(北寧市)、李嵐清赴陝西(涇陽縣)(中新社, 2000.2.20)。3月下旬江澤民前往廣東高州部署, 於數萬言講話中將新時期「黨建」問題提到國家興亡之高度, 並指出應將「三講」與中央有關改革、發展、穩定的各項工作部署緊密結合(新華社, 2000.2.20), 該講話成為「三講」綱領性文件, 宣示中共高層以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處理當前問題之堅定決心。

推動黨風廉政建設, 懲處貪腐要案

中共高層懾於貪腐橫生之嚴峻形勢, 將「從嚴治黨」的方針貫穿到「三講」教育整個過程(以「講正氣」為切入點), 以克服用人不正之風及廉潔自律問題。1月中旬中紀委召開第四次會議, 揭示2000年為「十五大」反腐敗工作之關鍵年, 應加強政治工作、組織工作、經濟工作和群眾工作紀律。江澤民指出要從思想、作風、紀律、組織狀況與戰鬥力加強黨建, 「治國必先治黨, 治

黨務必從嚴」，首先要治理好領導幹部，該重判者堅決重判，絕不手軟；若黨的素質不好，最後甚至可能垮掉，故須加強「三講」，以免亡黨亡國(新華社，2000.1.14；中央社，2000.4.1)。中計委主任尉健行宣示特別要對金融、證券、房地產、物資採購、司法及幹部人事工作等重大貪污案立案審查(新華社，2000.1.12)。

上述江之講話經「國務院」、中央機關、省級黨政部門傳達部署，「從嚴治黨」又成為今後一段時期重點工作，並於3月「兩會」期間成為主要議題。「最高人民檢察院」亦揭示為執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今後將改革內、外部監督制約機制，進一步深化檢務公開(新華社，2000.3.3)。「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韓杼濱則於紀檢監察會議中提出「廉潔從檢」10項紀律(新華社，2000.2.29)。

中共高層領導中朱鎔基對懲貪表現出極大之決心與行動。1999年底以來大陸與美完成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經濟情況逐步好轉、朱鎔基地位趨於穩固，重新掌握經濟決策主導權，爰集中心力處理貪腐大案。首要關注點即號稱中共建政以來最大案之廈門遠華走私案(傳涉及劉華清與賈慶林等高官)，據悉朱投下大量心力督辦該案，要求嚴格徹查。惟因案情複雜，迄未結案。惟據悉江澤民有意緩和該案，將懲治層級加以控制，以免危及高層穩定。

四、地方政府機構改革方案次第推行

重點推動北京市、廣東省機構改革

中共建政以來第七次機構改革(1998年啟動，「國務院」一級於1998年底完成)旨在按「精簡、統一、效能」原則推行。重頭戲之省(市)一級機構由各地針對自身特色相繼制定方案實施，各地步調不一。自1999年初規劃施行以來尚無任一省(市)完成改革，甚至若干省分尚未起步，至於縣(鄉)級機構改革亦幾無進展，進度嚴重滯後，絕無可能按原計畫於2000年底全部完成。

北京市機構改革原訂於1999上半年制定方案，下半年組織實施。遲至2000年1月下旬方正式開展，對大陸其他省市有帶頭指標作用，新華社指出其「拉開了中國地方機構改革的序幕，其他30多個省、市、區的機構改革將隨後全面展開，計畫在3年內初步完成」。並稱專家估計機構改革作為政

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能需 5 到 10 年才能實現精簡高效、協調運轉的目標(新華社，2000.1.29)。按照中央批准之改革方案，北京市委機構由 17 個精簡到 12 個，人員編制精簡 20 %；市政府機構設置由 67 個精簡為 45 個，50 % 行政人員將分流。預定第一季完成「三定」工作(定人、定崗、定編)，3 年內完成分流(新華社，2000.1.23)。2 月下旬廣東省緊接著正式出臺政府機構改革方案，並投票決定各廳局主要負責人選。經調整後的省政府部門由 57 個減為 41 個，預計省府機關人員編制精簡 49.9 %，廳級領導職數精簡 15 %，處級領導職數精簡 25 % (新華社，2000.2.24)。

由於此次地方機構改革規模為中共建政以來僅見，涉及廣大幹部利益調整及改革開放與社會發展較深層矛盾，其難點反映在轉變政府職能、幹部抗拒心態、人員分流困難及缺乏嚴格的法律保障等，相關進展恐不容樂觀。是否陷入過往「精簡—膨脹—精簡」的窠臼，有待觀察。

改革幹部選拔、任用制度

大陸當局體認在機構改革的過程中，須輔以人才競爭激勵機制作為組織保證，並著眼於培養優秀具潛能之幹部，作為新一代領導班底。重心在於幹部考核、監督、約束制度的建立，以匡正政府工作執法不嚴、辦事效率不高、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問題。據悉上年 12 月「國務院」黨組提出政治體制人事改革方案建議，指出關鍵與當務之急係解決幹部制度，包括終身制、任用和選舉等問題(羅冰，「李鵬又向朱內閣進攻」，*爭鳴*，2000.3，pp.6-8)。

1 月上旬曾慶紅於「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中指出當前幹部工作應著力解決 3 個緊迫問題：從保證黨的事業後繼有人及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選拔優秀的年輕幹部；加強監督檢查黨政領導幹部；為科教興國及現代化建設(尤指西部大開發)提供人才支持。當前幹部制度改革首要推進公開選拔工作，擴大公示制試點，及任期制、聘任制及試用期制，完善考核制度，加大幹部交流工作力度(新華社，2000.1.9)。渠於接受瞭望新聞週刊專訪時再次強調將制定今後一個時期幹部制度改革的總體規劃，針對目前各級領導幹部年齡結構不合理現

象，推動年輕化與破格提拔(瞭望新聞週刊，第八期，2000.2.21，pp.3-5)。

在地方實際執行方面，海南省對省、市、縣黨委、政府職能部門副職領導進行公開選拔(公開職位、報名、平等競爭、擇優錄取)、試用1年、任前公示之程序。1月上旬海南省組織部於地方新聞媒體公告6個廳級職位擬任人選情況(姓名、年齡、性別、民族、文化程度、歷任要職等)，公示10天後再提請省人大常委會任命(新華社，2000.1.15)。廣東省珠海市則推動更為大膽的幹部改革計畫。1999年底發動民眾「萬人評政府」活動，市國土規劃局及民政局被評為不合格，市政府愛全部免除12位科長職務，透過媒體向社會公開招聘新任科長。市府領導人並稱倘群眾仍不滿意，將追究前述兩局更高層次領導之責任，未來同樣措施亦將擴展到其他部門，甚至市政府本身(中新社，2000.3.17)。

大陸政情穩定的負面(不利)因素

一、中共高層較勁升高

「十六大」江是否延任浮上檯面

有關江澤民於「十六大」是否延任，近來於北京政、學界及外交圈之討論聲浪日趨升高，成為眾所關心之重要議題。外界對江權力絕對化之「皇帝」作風批判聲浪日高，已逐漸成為威脅江政權安定之要素(法國廣播電臺，2000.2.1)。近來批評集中於江澤民長子江綿恆於本年初被拔擢為「副部長」級的「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一般咸認江綿恆於科技方面並無特別建樹。據悉喬石(前「人大委員長」、李瑞環(「政協委員長」，近日益升高批判黨內之言論)、劉華清(前軍委副主席)等為首者對江尋求延任之動作頻頻反彈，要求江信守屆齡退休之原則，屆時交棒。而包括元老級之軍頭皆聯名上書要求渠勿再連任(中國時報，2000.4.1，p.13)。上年12月喬石於中央政治局退休老幹部聚會中，披露1997年「十五大」前夕中央政治局曾決議總書記乙職只能兩任，暗示江應放棄連任。渠並批評當前理論宣傳工作突出搞個人及領袖迷信，係踐踏了黨章(喬石於「十五大」時因年齡過高遭江逼退。羅冰，「喬石」暗促江澤民放棄連任，爭鳴，2000.1.pp.6-7)。

江之親信曾慶紅則於內部會議中以鞏固黨的團結、第四代接班人尚欠歷練等因素力陳江延任並無不可。其他支持者則稱鄧小平實際上至 1996 年方不能視事，故江實際任期迄今只邁向第 5 年(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0.2.16)。預期有關江的動向及高層權力再分配將持續成為政治關注焦點。惟據傳江近於內部會議表示俄羅斯總統葉爾辛辭職乙事對中共解決政治接班問題有所啟發，應讓胡錦濤加快承擔黨、國家、軍隊更多領導事務(唐文成，「江澤民發表交班講話，朱鎔基做了經濟報告」，鏡報月刊，2000.3，pp.20-23)，未悉是否預示將逐步讓出最高權力位置。

另一方面李鵬抓權企圖日趨明顯，聯合保守派勢力對改革派反撲(李拉攏軍方強硬勢力、是否加入WTO形成兩派對峙觀點)，而黨內改革派、極端民族主義者及軍方亦伺機擷取重要職位。上述情勢皆預示未來兩年半大陸高層政局將再現波瀾，各項社會不穩定因素之激化亦恐將助長矛盾鬥爭危機，第三代核心是否至「十六大」平順過渡，深值關注。

貪腐要案引發高層派系角力

廈門遠華走私案涉及高層貪腐內情，至今仍餘波蕩漾。據悉江以維護北京市黨政班子穩定為由，於該案袒護其親信賈慶林(前福建省委書記，現任北京市委書記)，已引起黨內嚴重不滿，質疑江反腐決心(日本讀賣新聞，2000.2.20)。直接負責處理該案之朱鎔基、胡錦濤及尉健行雖對外宣稱徹底查明，惟亦明瞭查處有其侷限，須於某一程度妥協，以降低可能之政治衝擊。目前賈慶林亦因該案導致北京同僚抗拒其工作指示，其政治前景業蒙上陰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0.3.14)。

跡象顯示系列反腐肅貪行動已成為中共高層政爭之工具。與「國務院」關係密切之前江西省副省長胡長青 3 月 8 日定讞處死，朱鎔基愛將前香港光大集團總裁朱小華遭「雙規」調查，象徵對朱系之反撲。2 月「國家審計署」披露三峽大壩移民計畫之資金遭挪用，暗指李鵬一系人馬涉及貪污。而江澤民、李鵬對重大貪腐案調子較低，與其親信(分別為北京市委書記賈慶林、「人大副委員長」

成克杰)涉及重大貪腐案件不無關連。

二、信仰危機，權力腐敗

共黨意識形態失落

黨員幹部對共產主義信仰淡化，出現思想信仰真空，使大陸當局陷入宗教矛盾之重圍。分析家指出當前大陸當局最深刻之挑戰，不在失業、通膨或腐敗，而是缺乏一個有效的意識形態(康曉光，「法輪功問題的政治效應」，中國社會導刊，2000.3，pp.33-35)。在法輪功趁虛而入情勢下，大陸當局針對其複雜性、尖銳性及長期性，誓言持續加以整頓，包括擴大拘押信眾(3月「兩會」會前達到高峰)及重判為首者(前空軍將領于長興於1月被判刑17年)，並將鎮壓重點自社會轉移至黨內及軍方(美國之音，2000.1.14)。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則以馬克斯主義唯物論、無神論及科學精神教育因應。江澤民甚至警告指出法輪功對共黨的威脅就如八〇年代波蘭團結工聯對波共構成的威脅一樣；其與待業農民、工人和少數民族分離份子皆為社會穩定最不利的因素(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0.2.12)。該一政治鬥爭之後續發展殊值關注。

貪腐弊端積重難返

年來幹部重大貪腐案件持續增多、金額龐大、手段隱蔽、涉案幹部層級漸提升、「國企」、金融、房地產、司法、關務等領域之經濟罪犯增多，制度性及根本性貪腐已引起民眾極大不滿，倘不有效遏止，恐將動搖共黨執政根基。中計委統計指出1999年揭發的瀆職事件達13萬零4百多起。本年3月間爆發廈門遠華走私800億大案，再次暴露中共幹部權力腐敗之深重弊端，顯示中共目前處於執政以來反腐敗鬥爭最關鍵亦最困難的時期。

共黨喉舌人民日報有感於腐敗可能成為「亡黨亡國」的致命因素，3月下旬專文指出中共面臨執政、改革開放及發展市場經濟的考驗，避免權力腐敗，確立法治的權威，已成為十分緊迫的課題(人民日報，2000.3.29)。然中共高層仍未切實體認反腐鬥爭癥結已非單純整黨整風問題，而係缺乏對黨員幹部有效之監督機制，牽涉到整個「國家體制」問題，對政權穩定之挑戰將日漸增

大。

三、「政改」呼聲再起

體制內外「政改」倡議迅速升高

自 1998 年底政策左轉以來，江澤民避談「十五大」揭槩之「政改」（局限在完善「人大」制度、民主集中制、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之範疇），相關倡議亦趨於沈寂。惟近來體制內外人士（各級領導幹部、學界等）鑒於政經體制結構扞格已嚴重左右改革發展全局，權力集中缺乏監督導致貪腐橫生，敏感之政改議題再次浮上檯面，認為係大勢所趨，要求中共高層領導嚴肅面對此一課題。

曾任周恩來秘書、鄧小平及趙紫陽顧問、「社科院副院長」之學者李慎之，於上年「十·一」期間撰成「風雨蒼黃五十年」專文，發表於網路及海外刊物。大膽直陳江澤民應速推動政改，進行議會民主、開放黨禁。指出「六四」已過 10 年，鄧小平已逝 2 年，大陸進一步改革之條件已「爛熟」；並引毛澤東所言：倘以堅持改革求穩定，則穩定存，以停滯倒退求穩定，則穩定亡（歷史月刊轉載，2000.3，pp.73-80）。該文於政、學界廣為流傳，一場政改風暴恐將蓄勢引燃。一批老資格學者之政改觀點，包括杜潤生、李銳、于光遠、吳江、王元化及朱厚澤等，再次引起討論與關注（本會資料，2000.3）。

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趙紫陽「十三大」報告起草人之一）於共黨刊物半月談內部版撰文呼籲政改，指出大陸政體改革的實質性和終極性目標，係實現由個人高度集權的人治向民主的法治體系轉換。目前迫切需要解決權力過分集中，特別是領導人高度極權的問題（王貴秀，「政治體制改革為何不能緩行」，爭鳴轉載，2000.2，p.11）。1 月間香港鏡報月刊發表「廿世紀留言—中國政治改革不宜緩行」專文，批評社會主義自身改革停頓不前、黨政分開議而不決、以「不搞多黨制與三權分立」作為擋箭牌，令人對當前領導人（括弧加註係「鄧小平的繼承人」）改革之一貫性及能力產生猜疑（鏡報月刊，2000.1，pp.58-62）。已將延緩政改矛頭直指江澤民。前「社科院副院長」劉吉（江澤民智囊）近撰文指出民主的關鍵在於上層、領導層的民主，例如選擇「接班人」就應建立一套科學、民主、法治的機制（鄭蓬，「輿論界：政治體制改革仍是最強音」，前哨月刊，2000.3，pp.12-14）。

朱鎔基亦提政改，江澤民面對政改呼聲審慎壓制

據悉朱鎔基自 1999 年底以來曾於若干場合重提鄧小平政改與經改同時進行之指示，認為大陸當前諸多問題根子在政治體制及黨的監督體制上。本年 1 月下旬於聽取黨外人士對「政府工作報告」草稿之意見時，指出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弊病之嚴重程度，已到了窒息國家發展及進步的境地，該一責任應由共黨自己承擔。渠贊成由民主黨派辦報、辦廣電來監督共黨政權（羅冰，「朱鎔基論政改石破天驚」，爭鳴，2000.3，pp.9-10）。該談話引起中共高層緊張，中央書記處及中央辦公廳指出係非正式講話，傳達時斷章取義，應從積極有利於社會、政治穩定及黨的領導等方面去理解。

據悉江澤民 2 月間與黨外人士迎春座談會再次指出世界上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政治體制模式，西方多黨制及三權分立絕不能照搬，此為重大政治原則問題。江之發言雖有抵制西化之用意，亦可視為針對前述日漸升高的政改呼聲予以壓制（香港信報，2000.2.11，p.21），並避免該議題延燒至 3 月間「兩會」，甚至「六四」11 週年紀念。2 月「兩會」會前中央書記處通令要防止會議主題錯誤集中到政治體制上，以免情勢失控（岳山，「防『兩會』失控的 10 條框框」，爭鳴，2000.3，pp.19-20）。而朱鎔基「政府工作報告」亦無政改有關議題。

整體而言，一般政改訴求為加強全國及地方「人大」權力、非黨員出任政府要職、農村直選向上擴展至城鎮、省市、制定新聞法及加強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建立專責肅貪機構以進行權力制衡等。未來隨著「一黨專制」矛盾深化，政經挑戰持續嚴峻，中共高層勢需於一定程度回應政改課題，要求政改之風暴勢將與 2002 年「十六大」權力再分配相連結。當前迄「十六大」江澤民是否迫於情勢作出相應宣示，為觀察指標。

四、異議人士持續零星抗爭，當局加緊鎮壓

大陸異議人士在當局的強力鎮壓下，近期活動低調，抗爭空間緊縮。「中國民主黨」活動重心轉至海外，盼以內外支援的方式，確保活動力度之延續。

1 月初「中國民主黨」第一屆歐洲代表大會於荷蘭舉行，通過黨章、選舉辦法、行動指南及迎接新世紀宣言，並決定發行網路刊物中國之聲(法國廣播電臺，2000.1.7)。2 月該黨創辦人徐文立(已被判刑 13 年)之助理劉世遵以「顛覆國家政權」名義遭大連當局判刑 6 年，新華社等各地媒體罕見地予以報導。上海支部 23 名成員則聯名抗議當局羅織「故意殺人」之刑事罪名，判刑核心成員戴學忠 4 年(自由亞洲廣播電臺，2000.2.4)。

1 月中旬異議人士秦永海上書「人大」，要求制定「宗教自由保護法」(法國廣播電臺，2000.1.16)。2 月下旬著名政治體制改革者方覺(前福州計委副主任，曾發表「民主派綱領意見」，1999 年中以「非法商業活動」被判刑 4 年)致函「司法部」，指控北京監獄非法將之列為嚴管犯人，剝奪應有權力(法國廣播電臺，2000.2.25)。

2 月下旬、3 月初「兩會」會前，大陸當局加緊嚴密部署，慎防異議份子及法輪功信眾等藉機滋事，政法系統層層下達指示，要求各地官員「制止串連，防止密謀鬧事」。前趙紫陽秘書鮑彤、「六四」受難者家屬丁子霖等皆遭全天候監控，多位「中國民主黨」成員則於大陸各地遭關押(中央社，2000.3.1)。

「中國民主黨」(北京、江蘇、四川支部)則同時發出公開信，呼籲大陸當局儘快批准已簽署年餘的兩項聯合國人權公約，落實對人民權利之保障，並釋放被拘捕之民主黨人士(美國之音，2000.2.25)。

大陸當局將控制手段延伸至出版界。年初以來先後於上海及貴州兩地逮捕 4 名中國文化復興通訊負責人，指控自上年 12 月非法創刊以來運用網路傳播訊息。該雜誌屬「中國文化復興運動」(1997 年下旬由數十位作家、詩人及記者發起)之一環，旨在創建不受中共意識形態拘束之自由文化空間，以推動言論、思想、宗教自由及保護人權。預計當局將以「顛覆國家政權」起訴(中央日報，2000.2.13, p.9)。而新官場密經乙書因揭露大陸官場上買官及賣官醜態，深刻描繪腐敗內情，據悉江澤民親自下令查禁。該書編者李哲及王慧民業於 1 月中旬遭拘捕(中央社，2000.2.18)。該一緊縮情勢於可見之未來勢將持續。